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以湖北省 Q 村为例^{*1}

朱元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4)

【摘要】: 发展人的城镇化是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仅仅只是实现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更要求农民工可以实现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 同时也要求农民工在思维意识、价值观市民化。但由于农民工是“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身份的叠加, 导致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境, 解决好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帮助农民工市民化, 更好地完成人的城镇化目标。

【关键词】: 人的城镇化; 农民工;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历程, 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不到 18%, 到 2017 年的 58.52%, 但是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 42.35, 城镇化率的“剪刀差”折射出我国城镇化事业出现了质量问题。李克强总理指出,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到 2020 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60%,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 但是, 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为“农民”和“市民”两种身份, 身份伴随着相应的地位、权利, 并依据身份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和均等公共服务获得。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生活, 发生了职业转变、角色转换, 但是他们的身份却仍旧没有变化。身份与角色的差异, 导致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困境, 而解决好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 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到城市, 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

2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将认同分为三种: 合法性认同、拒斥性认同、计划性认同。具体到本研究而言, 农民工身份的合法性认同是指国家制度性界定的身份类别; 拒斥性认同则是对自我内群体的身份认同, 即对自己目前身份归属的判定; 计划性认同则是对自身未来身份归属的认同。笔者通过对湖北省 Q 村农民工的调查发现, Q 村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制度性身份分类的矛盾

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生活, 从地的角度来看, 他们具有市民的特征, 他们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 这是

¹ 收稿日期: 2018-03-20

作者简介: 朱元 (1992—), 男, 湖北孝感人,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他们身份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户籍才是个人身份的内在制度性设定，所以本质上，农民工的身份还是农民。农民工一方面希望可以继续扮演好自己工作的角色设定，另一方面却无法摆脱自己制度性的身份设定，而他们身份的内在制度性设定与其外在角色设定不一致，说明了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困境。

2.2 目前身份归属的矛盾

个体在判定自己的身份归属时，不仅是其主观直接判断的结果，还是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较的结果。笔者通过对湖北省Q村农民工的访谈调查发现，Q村表示自己的身份与留守在农村的村民不一样，认为自己的身份比他们高，但是与市民相比，他们又觉得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较低、身份地位比不上他们。可以看出，Q村农民工不认为自己跟普通农民一样，想表达自己跟农民身份的不同，但是又认为自己比不上城市居民，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状态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目前省份归属的矛盾。

2.3 未来身份归属的矛盾

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表示，个体的计划性认同与拒斥性认同是否一致，是判定个体是否出现认同困境的重要表现。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对于Q村农民工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表示自己未来想做城里人，但是他们同样认为由于城市的房价、生活成本太高，城市不属于自己。不过他们表示自己不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因为“农村没前途，赚不到钱”。理想中的未来身份归属与现实身份归属判定不一致，说明了Q村农民工未来身份归属出现了困境。

3 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原因分析

关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原因的研究有很多解释，笔者用社会建构论和社会认同论来解释。社会结构论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个体是在不断发现、不断认识中了解客观世界，并且从这一过程中发现自身，建构世界。吉登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分析了现代社会自我认同的方法：个体在被社会结构建构的同时也在塑造着社会结构。他还认为社会和个人展开了“生活政治”，个体最终会对自身进行反思性重建。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其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

身份的自我认同是指“个体自我感知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占据的位置”。身份的自我认同是辨别“我是谁”的过程，是关于自身归属的认同。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指个体依据其生活经验不断认识其自身，并在不断反思中明确自我概念。”针对本研究而言，农民工身份的认同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3.1.1 乡土记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奇认为对于社会群体来说，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他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在中国，农民千百年的农耕生活让乡土成为了他们代际传递的最深、最原始的记忆。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其务农时间越长、农村生活越丰富，他们关于乡土的记忆就越深，也越容易让他们对于农民的身份产生认同。笔者在Q村调研时发现，农民工的乡土记忆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3.1.2 进城期望。农民工在进城前，基于已有信息的掌握会对城市生活有所期待，它承载着突破父辈社会阶层的梦想。农民工在进城过程中完成了职业、地域、角色的转变，如果他们持有积极的进城期待，往往他们会根据具体的环境变化，调适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观念思想，进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更好地融入到城市。但是如果他们抱有消极、不切实际的期望，往往在进城后因为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难以达到自己的期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会让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厌恶、抵触心态，这不利于他们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不利于他们对市民身份的认同。

3.1.3 城市体验。城市是引进新观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场所，与城市的频繁接触和互动有助于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但是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往往因为环境的变化、角色的转变、观念的冲突难以融入到城市，这与他们进城前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此时往往会感觉到迷茫，甚至是否定自己或社会。他们突破地域的限制进城工作，更多地是接受城市文明的浸染，如果在城市中体验到的成功，那么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入到城市，有利于其对城市产生认同，有利于其市民身份的建构。

3.2 农民工身份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不仅需要自我找到“我是谁”来明确自己的身份，还需要通过“他者”的建构使之明确化，尤其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对个体身份的建构尤为重要。一个群体共同的身份特征在说明了“我们是谁”的同时，也界定了“我们不是谁”。在城市的生活场域中，农民工与市民分别为不同的身份群体，对于身份较为模糊的农民工而言，市民的认同对于他们身份的建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的过程分为社会分类、社会比较、积极区分三个过程。

3.2.1 社会分类。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识别自己的身份群体的第一步就是依照社会分类，找到与自己有着相同特质的人，并将自己置于该群体之中，群体分类的依据就是群体之间的“边界”。对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而言，他们的边界就是户籍制度下的身份差异，而基于身份的差异可以导致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有所不同。在市民眼里，有“本地人”、“外地人”之分，时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分类，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很难找到归属感，他们自己很难培养主人翁意识，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赚钱的地方而已。3.2.2 社会比较。泰菲尔和特纳在社会认同理论中指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找到自己的群体归属，然后再对自己的群体内身份产生认同，并通过群体间比较来强化自己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市民与农民工属于不同的身份群体，市民往往会基于群体内偏好、群体外偏见以显示自己身份群体的优势，比如他们认为农民工不如自己，会更认同自己城市主人的地位，这导致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与城市的距离越来越大，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到城市。

3.2.3 积极区分。个体在将自己归属于一类群体后就会产生群体内偏好、群体外偏见。如果偏见一直存在，那么强势群体就会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弱势群体加以有意识的身份建构，建构出针对弱势群体的一种集体文化特征，进而可能会导致文化排斥与刻板印象。比如在市民与农民工群体中，市民群体往往会基于自己掌握的资源优势，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身份上的建构，比如对农民工群体冠以污名。“老土帽”、“乡巴佬”、“盲流”等都是明显带有歧视的话语，而这些歧视性话语往往会使农民工的自尊受到伤害，进而更加封闭自己的交际圈，很难融入到城市。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Q市的实地调研发现，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工在身份上往往会呈现认同危机，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身份分类的矛盾、目前身份归属的矛盾、未来身份归属的矛盾。而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态是由其自我、社会共同建构的，导致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比如农民工的乡土记忆、进城期待、城市体验都会影响农民工对于城市的认同。而社会认同方面，基于农民工与市民处于不同的身份群体，市民群体往往基于自身优势对农民工群体产生群体间偏见，导致农民工无法对其市民身份产生认同感。

基于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分析，笔者认为应当从农民工主体、社会、国家三个角度来解决。首先，农民工应当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含量。只有个体在整体素质上得到提升，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其次，社会应当营造轻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对农民工群体多一些正面、客观的报道，让农民工找到主人翁的城市心态，才能对其市民身份更加认同。最后，国家应当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身份“边界”，才能更好地让农民工市民化。只有农民工、社会、国家三者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帮助农民工走出身份认同困境，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

参考文献：

-
- [1]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夏铸九, 黄丽玲,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3] 阿列克斯·英克斯, 戴维·H·史密斯.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M]. 顾昕,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